

基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理论构建

——读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

□洪亦蔚

基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理论构建

特里·伊格尔顿，英国文学理论家、文化批评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早年毕业于剑桥大学。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批评生涯，著述颇丰。《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是1976年他为伦敦梅休因出版公司的简介性研究丛书编写的一本小册子，虽然只有一百多页，但它介绍的基本论点却是“根本性的”^①，不失为一部通俗的入门经典。

此书以《文学与历史》《形式与内容》《作家与倾向》《作为生产者的作家》为“四个中心论题”。纵览全书，人们会欣然地感到，作者在阐述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原理的同时，也在娴熟地运用着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

首先，作者从文学的社会性出发，有力地论证了文学及文学批评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密切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物的物质活动，与人物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②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观点，当代西方文论界往往是怀疑和反对的。伊格尔顿在本书第一章开门见山地引用这一论述，结合马克思在《政治

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著名论断^③，明确地把文学艺术称为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他告诉人们，透过文学是可以观察到现实世界，理解社会的发展过程。同时，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及其演化也“并不能归纳为仅仅是阶级斗争或者经济状况的表现”^④，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方法不能机械地“从‘作品’到‘意识形态’，到‘社会关系’，再到‘生产力’”，而应着眼于“这些社会‘方面’的统一体”^⑤。

作者还认为，意识形态拥有“一定的结构上的连贯性”，才能成为批评的对象，文学属于意识形态一分子，科学的批评就应当“依据意识形态的结构阐明文学作品”，而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批评方法是做得“最优秀”的^⑥。作者如此旗帜鲜明地阐述这一观点的真理性，袒示自己的学术态度，与当代其他西方文论在文学与意识形态关系上的有意掩饰和回避形成鲜明对照。

“文学生产论”是作者重要的文学主张，本书有章节专论，在同年出版的《批评与意识形态》一书中也有进一步拓展。作者认为文学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也是经济基础的一部分。所谓的“文学生产”，一是作为一般社会生产的文学生产，二是作为对意识形态的文学生产。不仅包含积累、构

[作者简介] 洪亦蔚，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

思、创作和传播等狭义的生产过程,而且包含了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广义的生产环节。与一般社会生产一样,文学生产力决定着文学分配、交换、消费的方式,而文学生产方式反过来又影响文学生产力。因此,所谓的作家、艺术家是“文学生产”者,文学创造是一种制造业,文学作品就是商品。在他看来,艺术中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就是“作为生产的艺术”与“作为意识形态的艺术”之间的关系,它是“马克思主义批评当前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⑦。

其次,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整体观和发展观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进行了表述、评价和批判。作为一个自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批评是依据产生文学的历史条件来分析文学的,同样,它还需要了解它本身的历史条件”,要“讨论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最有效方法,应该是对从马克思和恩格斯起直至今日的这类批评作一个历史的考察”^⑧。因此,在本书中,作者试图让不应该完全被称作“学科”的马克思主义批评,脱离纯“学院式”的束缚,突破“书斋式”的局限,走向现实,走进历史,并且将其置于改造人类社会的“更大的理论分析体系”,以此来通过文学去“理解意识形态”,进而“更深刻地理解过去和现在”^⑨。

同时他还提出,马克思主义批评应立足于作品、意识形态、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等社会各种因素。它一方面要将“过去的文学”同今天“反对剥削的斗争”结合起来,从而有效地改变现状;另一方面也要更好地“弄通作品”,从而产生“适应更优秀的艺术与美好的社会”的艺术形式^⑩。

在“勾画出植根于历史的这类批评随

着历史变化而变化的线路”中,作者也非常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质疑和批判。如在《作家与倾向》一章里作者从历史到现实,从国外到本国(英国),对斯大林、列宁托洛茨基、卢卡契、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三四十年代英国文学界有关文学政治倾向的观点进行了反思,尽管言辞激烈,但言之坦诚恳切。

作为创作方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上个世纪30年代苏联文艺界提出、斯大林确定的,曾对苏联、东欧和中国的文艺产生强烈的影响。伊格尔顿称之为布尔什维克革命在文化上的最大损失,是文艺以“社会解放的理论与实践这一名义”,经受的“近代史上前所未有的摧毁性打击”^⑪。文学阶级性和党性,最早出现于列宁《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一文^⑫。伊格尔顿认为这一所谓的创作原则,只适用于党的文学,是“党的理论著作”而不是“小说”,其文学趣味是“保守的”,只适合于“欣赏现实主义”^⑬。然后他又强调了恩格斯认为政治倾向应该是“自然的流露出来”,而“不应当公开地表现”,因而,他表示文学作品“表现出明显的政治倾向显然是不必要的”,政治倾向也“不能当作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基础”^⑭。

对于文学的“反映论”,伊格尔顿也持质疑态度。在他看来,文学“反映”现实的公式是粗略的,很不确切的,文学与客观社会的关系不是反映式的、对称的、一对一的。他赞同马舍雷的观点:“这是一面破碎的镜子,放在朝向现实的某一个角度,显示出来的形象是残缺不全的……”借助卢卡契的理论,他还提倡现代作家不应当只是反映“后期资产阶级社会的绝望与厌倦”,而更应努力地“批判这种无能为力”,进而“超越

读书·随笔

基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理论构建

它”，“提出新的积极的希望”^⑤。

第三，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对前辈的理论进行批判地继承与超越。伊格尔顿的文学思想深受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思想家的影响，如乔治·卢卡契、安东尼奥·葛兰西、瓦尔特·本雅明、西奥多·阿多尔诺、赫伯特·马尔库塞和保罗·萨特等。然而他并不沿袭复制，人云亦云，而是对现成理论进行重新阐释，这正是伊格尔顿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一大贡献。例如，从总体而言，在分析研究社会生活方式上，他借用了自己老师威廉斯的文化动态发展方法，但他却扬弃了老师的经验主义立场；他虽然十分推崇阿尔修塞和马舍雷对文学与意识形态所揭示的结构联系，并提出“正因为它具有这种相对的连贯性，它才能成为科学分析的对象。”与此同时，他却不赞成阿尔修塞“艺术不能被简化为意识形态”的观点^⑥。再如在“文学生产论”上，他接受、肯定了本雅明和布莱希特在一般社会生产意义上的艺术生产理论，但他又认为他们没能解决“把作品当作一种生产方式来分析与把它当作一种经验方式来分析”^⑦，提醒人们更应重视两者如何有机地结合起来的问题。

他还以古代部落的行吟诗人、中世纪“庇护人”体制下的诗人、资本主义市场供需体制下的诗人为例，说明在不同时代存在着不同的文学生产方式。而同一时代、同一社会，也存在不同的文学生产方式，文学样式之间也具有支配、从属地位甚至排斥的不同地位。而同样的文学生产又可以分属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文学生产方式亦可能承载着同样的意识形态。这些论述都与他的前辈不相一致，是作者原创的。

在文学的内容与形式问题上，他一方面反对文学的形式主义，抨击那些纯技术性而剥夺其历史意义的“审美游戏”；另一方面，又重申马克思主义文学不只是一种“文学社会学”，它还要“敏锐地注意文学作品的形式、风格和含义”，批评一味地探索政治内容的“庸俗马克思主义”^⑧。

此外，作者的论述很注重对本土实际的联系（如《作家与倾向》一章里专门评述了“文学倾向与英国马克思主义”），资料翔实充分，耳熟能详的具体文本与经典理论相联系，条分缕析、评述结合。文笔深入浅出，语言通俗易懂，“努力做到不冗长乏味，也不神秘化”^⑨，很容易被普通读者所接受。

伊格尔顿的理论构建，在当代西方文论界具有重要地位。“他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批评在新的形势下仍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从而使之成为当代西方各种批评理论中的重要一支立下了汗马功劳”^⑩。尽管此书写于三十年前，作者的学术思想也有了发展，但作为一本从内容到方法都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原著，它对于人们认识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流派，至今仍是很有益的。■

注释：

①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第1、17、12、23、81、1、2-3、82、43、46、51、55-57、21-22、80、24-27、1页，文宝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②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④《列宁选集》（第1卷）第646-651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⑤王宁：“特里·伊格尔顿和他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载《南方文坛》2001年第3期。